

·珍藏撷英·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经楼研究

黄建年 (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古代寺院藏经楼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社会活动也相当频繁。除直接服务出家僧侣、在家信徒外,藏经楼还有服务儒家士子、供养寺僧之功。寺院藏经楼经费来源不尽一致,其所藏佛教图书比例亦有很大差异。藏经楼藏书来源多样,其载体类型亦至为繁杂。

关键词:藏经楼 寺院藏书 佛教图书馆 图书馆史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1)03-0139-06

A 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Buddhist Sutra Mansions

Huang Jiannian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The managers of ancient Chinese Buddhist sutra mansion have high social status and simultaneously they were also very active in social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the monks and the lay Buddhists, Buddhist sutra mansions could also serve Confucian scholars and support the monks. Buddhist sutra mansions have different sources of funds and their diversity of proportion in Buddhist books. The sources and carrier types of collections in various Buddhist sutra mansions are also multifarious.

Key words: sutra mansion; Buddhist monastery collection; Buddhist library; library history

CLC number: G256.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3-0139-06

有关佛教寺院藏书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改善藏书编目、呼吁藏书开放、研究藏书历史与成因、寺院藏书流通与管理等方面,既有总体肯定佛教寺院藏书在文化史上的贡献方面的论文,亦有专门研究某一具体寺院藏书概况与管理的作品,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从寺院藏经楼管理者、服务目的与服务对象、藏书来源以及藏书类型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却鲜有见及,本文就上述诸方面作一探索。

1 管理者

1.1 地位

在古代的佛教寺院中,除一寺的最高管理者——方丈(或称住持)以外,尚有两序执事僧。据元朝中叶成书的《百丈清规》记载,大的禅宗寺院设置有东序六知事、西序六头首。其中,东序选精通世事者担任,称“知事”,其职位名称有都寺、监寺、维那、副寺、典座、直岁等。西序选学德兼修者担任,称“头首”,其职位有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知浴、知殿等。^[1]

寺院藏书的管理者称为知藏,是西序第三位头首,一般要遴选兼通义学和佛藏的僧人担任。与知藏任职相近的还有藏主。知藏与藏主原为一职,后来因职务繁重,则一分为几,协典经藏。“凡函帙安置、修补残缺,以及经本出入等事,俱知藏总其纲,而藏主分其职。”由此可知,知

藏相当于寺院图书馆馆长,而藏主相当于寺院图书馆的馆员。^[2]但知藏、藏主、主藏与守藏四者经常混用,如清代嘉庆年间浙江巡抚阮元在杭州灵隐寺建立书藏,有“守藏僧二人”,分别为云林寺玉峰、偶然二僧。^[3]

《金石萃编》卷一五七《灵岩寺记》(勒石于金明昌七年即南宋庆元二年)中的记载则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确定其地位:“首座僧即敏,书记僧普置、知藏僧蕴奥、知客僧宗彻、知阁僧广伸、殿书僧宗坚、监寺僧法叙、副寺僧普迁、维那僧悟宝、典座僧普守、直岁僧志功、库头僧……”^[4]

此段描述,明确指出了各执事僧的排列顺序。这至少说明3点:(1)在佛教寺院中有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知阁、殿书、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库头等职务;(2)在南宋时知藏在寺院中之地位仍然比知客、维那、监寺为高;(3)勒石文字记载一般为文比较慎重,为规范文体,所用语言在当时应该具有较高的通用性,排列顺序基本为当时的共识。

清代阮元在其杭州林隐寺《书藏条例》规定:“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知文字之僧充补之。”^[5]由此可知,守藏僧由方丈直接任命管理,类似于当今高校图书馆馆长由校长直接任命的模式,其在寺院地位相对较高,当无疑问。

当然,各时代知藏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宋元时期寺院盛行“左钟楼右经藏”的布局形式,至清代则普遍将藏

经阁置于寺院中轴线最末端(图十一)。这一格局说明有清一代寺院对经藏具有崇奉情结^[6]同时也说明清代寺院藏书以及藏书管理者的地位基本确定。

1.2 与外界交往

寺院藏书的管理者与藏书打交道,因而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深的佛学素养。由于这一因素以及其在寺院中的较高社会地位,经藏管理者往往与佛教信徒有着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着诗文的唱和来往。正史及佛教传记中此类记载亦多,足证藏主社会活动频繁。如琳藏主曾搜集当时文人北山纪游诗八首,并装演成卷^[7]固然有宣扬佛教与本地寺院、扩大社会影响的因素,但亦有资料搜集、整理性质,有积极主动的成分在内。

当然,经藏管理者本身的身份是僧侣,参禅悟道,以求明心见性、圆满成就佛陀的智慧,才是其终极目的,所以有关藏主参禅悟道的文字要远多于对各类经藏的搜集与整理。比如《景德传灯录·行思禅师第十世》记载,经藏僧道齐禅师遇法灯禅师点化,而得明心见性,成为行思禅师第十一代传人。^[8]此类文字在各种佛教史论中常见,不再转述。

2 服务目的与对象

2.1 服务目的

2.1.1 出家僧侣阅读

寺院设立经藏,其首要服务对象是出家僧侣。出家僧尼日以诵经为业,自然不能离于经典。但除一般功课外,所需经典不可能自行备办。再者,佛法主张流通,僧侣用毕亦会赠送寺院或有缘之信徒。因此,利用寺院藏书亦势所必需。宋代张商英述《续清凉传》载:“有代州圆果院僧继哲,结庐于山之阳,阅大藏经,不下山三年矣。”^[9]阅览藏经需时三年之久,更有甚者,润州牛头沙门释法融在丹阳南牛头山佛窟寺对藏经“内外寻阅,不谢昏晓,因循八年。”可见藏书之丰。^[10]

2.1.2 在家信徒阅读

佛教在家信徒,统称为居士,细分为优婆塞(男众)、优婆夷(女众)。要想深入了解佛法,阅读寺院藏书应该是进德修业之必经之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常与庐山长老于东林寺经藏中,披阅远大师与诸文士唱和集卷。”^[11]可见白居易不止一次阅览东林寺经藏。

2.1.3 士子读书

阮元任巡抚时,曾有感于当时“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之状况,于是设灵隐书藏,继而又立焦山书藏,主要目的在于解决贫寒学子阅读图书之难。他在《诸君子集灵隐置书藏纪事》中明确指出:“或有访书人,伏阁

细披看。”^[12]任何有志于学之人均可阅览寺院藏书,就此点而论已经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之性质。

2.1.4 供养寺僧

一般来说,寺院常拨出经费支持经藏建设与管理,但亦有偏远小型寺院因前代遗留经藏而导致香火旺盛,供养寺僧之情形发生。《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第一百十四卷·云门山部汇考》有一记载可以佐证:

(显圣院)院后有王子敬笔,仓有经藏,甚灵异,院尝无主僧,郡牧或毁其法堂以修园馆,然经藏如故已。复小葺,僧童无产业,赖经藏以给。今废。^[13]

显圣院曾名看经院,与寺院所藏之经藏关系密切。经过稍稍修缮以后,恢复经藏开放。寺僧无产业,“赖经藏以给”,通过开放经藏获取一定的供养。按照一般寺庙藏书开放模式,此寺当时不可能实行现今的有偿阅览制度。但看经者往往乘便供养寺僧,古今寺院率皆如此。因此此寺利用其丰富的经藏,吸引佛教信徒和普通士子前来阅览,从而间接提高寺院的知名度,则大有可能。

2.2 服务对象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认为,服务目的决定了服务对象,佛教寺院藏经楼亦不例外。具体服务对象如下:

2.2.1 僧尼

寺院藏书的发展,首先应该满足僧尼诵读经典的需要。自东汉以来,佛教在中国各地逐渐得到传播。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到东魏末年,魏境“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4]至北周武帝灭佛教,还俗“僧尼二百万”。僧尼数量超过200万以上,对寺院藏书的需求量也至为巨大。隋代扶持佛教,因而佛教寺院藏书亦随之得到迅速发展。元朝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有寺院24,000余所,超过当时各级学校的数目。由此可见,僧尼对藏书的需求已经超过当时的生徒。

2.2.2 居士

根据僧尼的总人数,可以推测当时居士的数量。以一名僧侣有信徒20人计算,唐元代僧侣均在20万以上,则居士总数当在400万左右。宋太宗时僧尼共有45万人。明代僧尼人数与此相近,“估计全国有僧50万”。以此估计,宋明二代居士人数当在900至1000万人之间。清代僧尼较宋明为多,“清末各省约有80万僧”,估计清末居士人数当在1,600万人以上。^[15]

2.2.3 儒家士子

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曹仕邦先生认为,接纳读书人在寺院居住是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的顺俗政策之一。寺院藏经阁中除了度藏佛经之外,更有儒家经史,可供士人借阅。^[16]

宋代李常少年时期在庐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刻苦攻读,后来中了进士,将自己私藏及购置图书9000余卷存

放在白石庵,以供山中读书人自由阅读,人称“李氏山房”。好友苏轼为此专门撰写《李氏山房藏书记》,称赞李氏之善举。李氏山房藏书面向全社会开放,无疑已经具有现代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3 藏书建设

3.1 藏书经费

3.1.1 国家拨款

汉文大藏经在一千多年之间先后有二十余次刻印(图三)。就中国古代政府所雕刻的《大藏经》而言,现存有《开宝藏》(封面)、《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永乐南藏》(图六)、《永乐北藏》(图九)、《龙藏》等版本。所有官方雕刻印刷大藏经所需经费全部由国家拨付,并由高僧大德指导,质量极高,印刷完毕后直接颁赐全国著名寺院。尽管各寺院不能直接获取藏书购置经费,但实际上各寺院得到的是以大藏经实物支付的经费。

3.1.2 个人捐赠

个人捐赠类型众多,力小者或赞助一文一粒,大能者或捐资巨万,儒家士子或以文集相赠,使者、学僧或载经而至。赞助一文一粒者多不载于史传,捐资巨万者则往往有之。略举二例如下:

其下有水阁院,兴国中锡名隆教……保大八年,南唐袁国孝定公徐景运重修。藏经亦公所施,皆有跋尾,藏之西壁。^[17]

徐景运以一人之力重修寺庙,于藏经购置亦不会吝惜,所捐藏书数量当不在少数。

出之凡九十篇二十万言,河南居士竺叔兰练解方俗,深善法味,亲共传译,今放光首品是也。^[18]

佛家有外财布施和内财布施之说,徐景运属于外财布施,而竺叔兰直接参加佛经翻译工作,属于内财布施。与此相似者尚有参加经典翻译的唐宰相房融(参加翻译《楞严经》)、会集经典的清人魏源、彭际清(会集《无量寿经》)等,实际上很多经典的翻译、搜集、整理,均有在家信徒的默默奉献在内。

至于白居易、苏东坡等,与佛教寺院藏书之缘,今人多有提及,此处不再罗列。载经而来者,史传记载触目皆是。汉文大藏经多由梵本翻译而来,而其梵本或由东土僧人去西天求法载经而归,如东晋法显、唐代玄奘法师之流,前赴后继;或由印度西域僧人东土传法携经而至,如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辈,络绎不绝。如《续古今译经图纪》记载:“善无畏…以开元四年景辰大赍梵本来届长安。初于兴福寺南院安置,次后有敕令住西明。”^[19]

善无畏曾从印度带来梵本经典,佛教史传中多有记载,可见此事非虚。无疑梵本经典及其随后的翻译均大有功于中国寺院藏书。

3.1.3 官府固定拨付

寺院藏书收藏多寡多依时节因缘而定,或向普通信徒结缘,或由王公大臣慷慨乐助,或由个人直接赠书,亦或由国家直接颁赐经藏,凡此种种,均无一定之规。绝大多数寺院藏书并无固定经费,逐年投入,所以盛衰荣辱常见,汗牛充栋之藏常常灰飞烟灭,令人为之兴叹。但也并非没有明眼之人,清代阮元在江苏镇江焦山书藏明确规定:“由盐运司月约香灯钱十两,积之以为修书增橱之用。”^[20]由此可见,焦山书藏所需费用由盐运司所出,属于官方固定拨付性质。阮元一生历乾隆、喜庆、道光三朝,属于清代鼎盛时期。每月十两银子的经费,以当时社会生活标准而论,属于相当优厚的经费支出,非常有利于焦山书藏的延续。焦山书藏的规模逐渐扩大应该说与这一措施的实施很有关系。

3.2 佛教图书的比重

寺院藏书以佛教经典为主,辅之以善男信女抄写和印造,以及文人墨客在寺院的藏书。宋代丹阳南牛头山佛窟寺所藏“七藏经画”,分为五大类:“一佛经,二道书,三佛经史,四俗经史,五医方图符。”^[21]其中三个大类为非佛教图书,数量应该不会低于佛教图书。清代阮元在江苏镇江焦山寺院购置书藏《焦山书藏书目》共著藏书1834种、2041部、34447卷、12122册,分经、史、子、集、志、丛六编,很显然其藏书不仅佛教大藏经而已。^[22]许嘉认为,寺院藏书中90%以上的是佛教图书,非佛教图书的比例在10%以内,实际上这一数字有待商榷,不要说各个时期寺院藏书比例有异,即使同一时代各寺院藏书比例亦有很大不同。寺院所藏佛教图书俗称“内典”,类型多种多样,大致有大藏经、大藏经之外的单本译经、大藏经之外的中国僧人撰著、疑伪经、宣教通俗文书、一般寺院文书、其它文字佛教典籍等等。寺院所收藏的非佛教图书,在佛教界通常被称为“外典”、“世学”、“非佛书”等,大致有世间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包括医书、志书、字书、阴阳、法书、蒙学著作、通俗读物、道教等其它宗教图书、僧人自著的诗文等非佛教著述,还有普通经济文书、年谱、家谱等。^[23]

4 藏书来源与载体类型

4.1 藏书来源

在江苏镇江焦山书藏中,诸贤所捐之书有抄本、排印本、官书局刊本、私家刊本、校印本等多种类型。^[24]台湾黄德宾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地区佛教图书馆发展之研究》中认为藏书来源有朝廷颁赐、私人捐置、募款请购、自行缮写或雕印等四种(图五)。^[25]可见,寺院藏书的来源非止一端,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数种:

4.1.1 官方颁藏

由官府利用国家经费抄写或者刻印佛教经典后颁发

给各寺院收藏(图十)。《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文帝在“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26]南北朝时齐肃宗孝昭帝“写经十二藏,合三万八千四十七卷……”^[27]如此数量的经藏,大多流入各寺院藏经阁(楼)。

4.1.2 寺院僧侣抄写或者雕刻

释慧进因生病发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前障”,最后“得以成经,满足百部”^[28]释智顗一人“写经一十五藏”^[29]释神照“写经数千卷。任缘便给,不为藏蓄。”^[30]甚至有僧侣将写经作为毕生事业,唐代定州中山禅师释修德“写经才毕,俄从永化。”^[31]

4.1.3 信徒抄写或者雕刻

宋代“建炎后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冯楫“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32]唐代裴休“集黄檗语要,亲书序引冠于编首,留镇山门。又亲书大藏经五百函号,迄今宝之。”^[33]可见此类作品藏于寺院当无疑义。应天万寿禅寺有“蜀王孟氏所舍藏经并铜佛像,制作皆精微可观”,^[34]所舍藏经应为精品。

4.1.4 个人文集赠送

因为寺院藏书流传长久,古代读书人有将个人文集赠送寺院收藏的习惯。白居易将自己文集60卷送入庐山东林寺经藏院收藏,宋陈舜俞撰《庐山记》载:“至大和九年……始以文集六十卷归之,会昌中,致仕复送。”^[35]可见白氏送书非仅一次。《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记载:“故其集家藏之外,别录三本,一本置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一本置于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一本置于苏州南禅字千佛堂内。”^[36]白氏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除家藏以外,还赠送了三处寺院,以便永久珍藏。此种做法或与现代图书馆呈缴本制度相仿,然白氏等人是自愿呈缴,而非国家规定。

大藏经中僧侣文集比比皆是,即以佛教三藏之一——论藏而言,亦无非僧侣所撰。

4.1.5 从各私家藏书楼搜集

个人文集卷数毕竟有限,而私人藏书直接馈赠寺院收藏则有使寺院藏书迅速丰富之效。宋代李常将藏书九千余卷赠送庐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南宋洪咨夔将藏书共一万三千余卷赠藏于天目山宝福寺。^[37]两次所赠藏书均洋洋大观,不要说原有寺院已有收藏,即使原寺院无藏书,仅仅利用此次赠藏,已经可以构建一座收藏丰富的藏经楼。

据王新田先生研究,清代兴建的焦山书藏(位于江苏镇江)中就包括了如下各藏书楼的藏书印:阮元的研经室、琅环仙馆、珠湖草堂等印;王柳村的柳村藏书印;丁丙的泉唐丁氏嘉惠堂、八千卷楼藏书、嘉惠堂藏阅书、四库

附存等印、梁鼎芬的节庵藏山数印、方功惠的巴陵方功惠捐置之印。^[38]可见这一寺院藏书,搜罗了多个私人藏书楼之书藏。

4.1.6 从市场购买

高丽僧人一然撰《三国遗事》载,慧照国师“市辽本大藏三部而来,一本今在定惠寺(海印寺有一本,许参政宅有一本)。”^[39]此条记载说明三点:(1)“市”说明了大藏经采集方式——购买,并非自己抄写或者请人抄写;(2)慧照国师共购买了3套大藏经,一次能够购买3套,说明佛教经典贸易较为繁荣;(3)其中有2套藏于寺院,一为定惠寺,一为海印寺。另外1套应该赠送给了许参政。高丽僧人可以购买辽本大藏经,说明大藏经可以公开出售,以贸易方式获得的藏书成为寺院藏书的一种重要来源。

4.2 载体类型

4.2.1 纸质经典

寺院藏书大多数为纸质,敦煌石窟中出土的佛教文物大多数即是此类。然纸质藏书中,有些是利用特殊材料书写而成。比如为佛教信徒所推崇的血经,乃信徒用鲜血书写而成。宋释僧法于宋绍兴十七(1147年)血书《尊胜咒》、《大悲咒》各一卷,供奉于灵岩寺塔内。灵岩寺为净土宗念佛道场,血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图二)“永供灵山”。^[40]释祿宏撰《往生集》载,净土宗七祖北宋省常法师“刺血书华严经净行品”^[41]宋释志磐撰《佛祖统纪》说,思照法师“刺血书法华七轴”。^[42]类似记载,佛教史传中多有,今日各佛教文物展览中此类经典亦不罕见。

当然即使同为纸张,因为所用原材料不同,纸质亦有很大差异,比如,我国云南地区前教经典期佛用贝叶作为材料,后来改用构树树皮纤维制作的棉纸,俸称薄嘎腊沙。这种纸张洁白、韧性好,较耐保存。^[43]

4.2.2 石经

历史上曾经有几次“灭佛”,佛教寺院遭到很大破坏,佛教信徒有感于经藏消失于世间,于是以石头作为材料雕刻佛经(图四)。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唐代幽州沙门释智苑“思造石经于西南山岩,以备法灭之护也”,于是“取方石写诸藏经”。^[44]闻名于世的房山石经即是释智苑及其门人前赴后继的杰出作品(图八),见者无不惊叹古圣先贤的专一之功、信仰之力。

4.2.3 贝叶经

据有关调查,以前西双版纳有佛寺500多座,保存贝叶经多达84000多册,可见用贝叶来书写佛经,为我国云南地区寺院常见的行为。^[45]实际上我国佛教寺院保存了不少贝叶佛经(图七),其来源有二:(1)来源于印度、西域地区。如《宋史·天竺国传》:“僧道圆自西域还,得……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46]汉文佛经三藏之经藏几乎均从梵文原本或者西域文原本翻译而来,所以数量庞大,惜乎

汉文经典一出,原典逐渐失传,印度本土无存,诚为憾事。

(2)本土所产。因为贝叶树只能生长在西藏、云南、四川等热带地区,因而贝叶佛经也主要集中上述地区的寺院。藏文贝叶式经典有两种,一种是大贝叶经,其经是用灯烟或木炭粉调肉桂油,涂在叶面上,用泥金或泥银书写,字迹醒目而珍贵,双面书写7行字,这是传世稀少的佛经宝典。另一种为小贝叶式经,用毛笔书写,以上两种手抄藏文经,由转世活佛和知名寺院大师书写。^[47]

利用贝叶书写佛经具有较悠久的历史。有学者认为,把经典正式书写在贝叶上,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间。^[48]但因为这类佛经或者来源异域,或者原材料不易获取,因而数量有限,在寺院藏书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此外,佛教经咒还抄写于幢、幡、宝盖等载体之上(图一),现今寺院藏经楼亦十分常见。尽管此类佛经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藏书,但寺院中此类书又在最显眼位置,方便用户阅读,实际效用极佳。

古代佛教寺院藏经楼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关的研究仍然处于零散、断续的状态,本文的研究只是选取其中的一个片断而已。至于寺院藏经楼开放性、衰落的历史与成因、对完善现在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借鉴作用等,仍然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来做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2]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181-83.
- [3][5]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EB/OL].[2010-10-16].
<http://www.docin.com/p-81771698.html>.
- [4]王昶.金石萃编·灵岩寺记[Z].北京:中国书店,1985:5.
- [6]赵文斌.中国佛寺布局演化浅论[J].华中建筑,1998,(1):116-117.
- [7]柳贯.柳待制文集·卷第二[A].四部丛刊·初编·集部[DB/CD].北京: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2001.
- [8][33]道原.景德传灯录[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1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428-293.
- [9]张商英.续清凉传[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51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1127.
- [10][22][30]释道宣.续高僧传[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0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603-528.
- [11]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东林寺白氏文集记[A].四部丛刊·初编·集部[DB/CD].北京: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2001:2.
- [12]阮元诗[EB/OL].[2010-10-16].<http://www.zhsc.net/2007/04/05/24785.html>.
- [13]陈梦雷.佛经部纪事一[A].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DB/CD].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1-2.
- [14]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48.
- [15]杜继文.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50-457.
- [16]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的顺俗政策[EB/OL].[2010-10-16].
<http://www.docin.com/p-74727693.html>.
- [17][35]陈舜俞.庐山记[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1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1026.
- [18]陈梦雷.云门山部汇考[A].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DB/CD].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4-5.
- [19]释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5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372.
- [20][24][32][38]王新田.焦山书藏述略[J].图书馆论坛,1998(4):76-77.
- [22]徐苏.镇江焦山书藏述要[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4):94-96.
- [23]许磊.我国古代寺院藏书简论[J].文献,2002,(4):176-191.
- [25]黄德宾.台湾地区佛教图书馆发展之研究[D].台北:辅仁大学,2010:123-157.
- [26]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99.
- [27]释非浊.三宝感应要略[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1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848.
- [28]释慧详.弘赞法华传[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1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28.
- [29]释觉岸.释宝洲.释氏稽古略[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49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804.
- [31]释僧详.法华传记·定州释修德十五[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1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87.
- [32]释居顶.续传灯录[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51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0:671.
- [33]荣红涛.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成因初探[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2):66-68.

- [34]陈田夫.南岳总胜集[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1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10: 1071.
- [36]白居易.白氏长庆集·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A].四部丛刊·初编·集部[DB/CD].北京: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 2001:1.
- [39]释一然.三国遗事[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49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10:993.
- [40]血经[EB/OL].[2010-10-27].http://www.fjdh.com/wu-min/HTML/47418.html.
- [41]释祿宏.往生集[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1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10:133.
- [42]释志磐.佛祖统纪[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49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10:221.
- [43][45]王蕾.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07 (7):138-140.
- [44]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A].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大正藏 52 册[DB/CD].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10:428.
- [46]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7:14107.
- [47]藏文佛经[EB/OL].[2010-10-27].http://www.foyin.com/plus/view.php?aid=67992.
- [48]关于佛经[EB/OL].[2010-10-27].http://blog.163.com/lmj1010@126/blog/static/6873275720108691523312/.
- 作者简介:黄建年(1966-)男,博士,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籍整理、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

(上接第 124 页)

占云馆,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北齐邺的太平寺,隋代长安的大兴善寺,唐代长安的弘福寺、玉华宫、福光寺、西明寺、资圣寺等。译经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抄写。据智昇《开元释教录》和陈士强《汉译佛经发生论》,古代佛经翻译总数为 2767 部、7865 卷。也就是说,这些译本都是寺院首先抄写的。除了原本之外,寺院还抄了不少复本。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不少寺院捷足先登,充分利用这种最先进的制版方式,弘扬佛教文化,先后刻印了不少大藏经和零种佛教著作。大藏经如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 年)福州开元寺刻印的《毗卢大藏》,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 年)平江硤砂延圣院刻印的《硤砂藏》,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 年)余杭大普宁寺刻印的《普宁藏》,明代五台山妙德庵、径山寂照庵等联合刻印的《径山藏》等。零种佛教著作如唐洛阳敬爱寺刻印的律疏、元代江陵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等。

4 寺院藏书重视典藏,编撰不少目录,促进了古代藏书建设和目录学的发展

如南朝梁僧绍编《华林佛殿藏书目》、隋释法经编《众经目录》、唐释道宣编《京师西明寺录》、唐释静泰编《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等,敦煌遗书中也有不少佚名编藏经目录,如《三界寺藏经目》、《金光明寺藏经目》、《安国寺经目》、《乾元寺经目》、《沙州诸佛寺藏经目》等。佛典在流传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总有或多或少的阙失,不少佛典目录都著录了阙本。阙本目录,使人心中有数,细心搜访,往往可以成为完帙。例如隋彦琼撰《众经目录》卷五著录阙本 378 部、677 卷,唐释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四和卷十五著录阙本 1148 部、1980 卷。而唐代一般图书的收藏“只记其有,不记其无,是致后

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库之书,比于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尤甚焉”。^[11]寺院编撰的阙本目录为继续搜访图书、保证藏书的完整性做出了贡献。

以上就是古代寺院藏书的主要贡献。我国古代有丰富的佛典文献,寺院藏书对古籍的保管和利用做出了不懈努力,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 [1]道宣.续高僧传·唐润州牛头沙门释法融传[A].大正藏 50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604.
- [2][3]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7:21.
- [4]方广锬.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汉文大藏经帙号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08.
- [5]白居易.白居易集·香山寺新修经堂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2:1130.
- [6]契嵩.潭津文集·无为军崇寿禅院转轮大藏记[A].文渊阁四库全书:1091 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47.
- [7]楼颖.善慧大士传录·卷一[M].刻本.续金华丛书,1924.
- [8]白居易.白居易集·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2:976.
- [9]范成大.吴郡志[A].文渊阁四库全书:485 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62.
- [10]叶梦得.建康集·建康府保宁寺轮藏记[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29 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616.
- [11]郑樵.通志略·校讎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22.

作者简介:曹之(1944-)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